

99岁版本目录学家，一辈子“泡”在图书馆，被誉为“古籍活字典”

“我的生命和书连在一起”



▲退而不休，沈燮元在南京图书馆的“工位”工作。 本报记者邱冰清摄

编目、买书，沈燮元在图书馆待了一辈子，看了一辈子书，觉得“自己的运气好得不得了”。他形容自己和书的关系就像鱼和水，“我的生命和书连在一起”

“我从中受益，知道了学问的门径，到现在我对它还有感恩的思想”

99岁的沈燮元感觉自己只有30多岁。生活简单、有不少忘年交，或许是沈燮元心态年轻的原因

1924年，沈燮元在苏州出生，原籍无锡。抗战胜利后，他考取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因为眼睛不太好，只读了一个学期，后以第二名成绩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校以教学生研读古籍为主要课程。

读书时，沈燮元喜欢戏曲小说，因此他想为屠绅作年谱。年谱，用编年体记载个人生平事迹的著作。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功业大、事情多的，材料少的都难作年谱，屠绅属后者。沈燮元用课余时间查找资料，毕业前用文言文写成《屠绅年谱略》在报纸上整版刊登。

1958年，该文章以《屠绅年谱》为名由出版社出版。“稿费相当厉害了，这书当时定价两毛，给我稿费500块。我买了块瑞士进口手表，又在南京新街口做了一身呢大衣，是进口料子，最后还剩下点零花钱。”更让沈燮元引以为豪的是，屠绅这个题目，后来还有很多人继续做，但基本素材都没能跳出《屠绅年谱》的“圈子”。

毕业后，沈燮元受当时上海合众图书馆馆长(当时称总干事)顾廷龙邀请，在该馆工作，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此后，沈燮元分别在无锡图书馆和苏南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短暂工作一段时间。自1955年10月来到南图，沈燮元在此工作直至退休。

一辈子在图书馆，沈燮元做两件事：编目、买书。他很开心：“我觉得自己的运气好得不得了。”

大路上成交的辽泥金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

在南图几十年，沈燮元为其采购数千种古籍善本。每年春天和秋天，沈燮元会到北京、上海、扬州、苏州等地为南图购书。“我买古籍很悠哉的。到书店仓库里找书，选好书抄好书单，请馆里查查，馆里没有的书就要买，重复的就从单子上剔除。书店把书寄到南京来，我再根据发票把钱汇出去。”

南图“镇馆之宝”十大珍品古籍中有两部都是由他买回的。其中，北宋熙宁元年金粟山广惠禅院写大藏经本《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

各地的古籍目录卡片规格、体例不同，甚至还存在信息错漏。在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他们需一一核查每张卡片的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在自身学术素养基础上，或是看原书或是核对书影，也因此著录的可信度高。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从出版到现在，虽已历30余年，但到目前还没有哪一部书目，在收书的数量、藏书的单位、著录的详明等方面能超越它。这样大型的古籍联合目录，不仅在我国图书馆界是首创，在近代藏书史上也是第一次，为学术界使用善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全程参与编纂，沈燮元在北京、上海两地共出差十年，生活艰苦时，一天只吃两顿饭。他说：“出差回来后，别人跟我开玩笑都说‘那个不要家的人来了’。”

二三十年只为编纂一本书

“时间来不及了，我现在不能荒废时间。”这是沈燮元近几年常说的一句话。

完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后，沈燮元已经到了退休年纪，他没让自己闲下来，而是继续因编纂工作中而中断的清代藏书家黄丕烈题跋集的整理工作。

黄丕烈，清代藏书家、校勘学家。他题跋的古籍，表明其在版本、校勘方面的独特价值，凡有黄丕烈题跋的古籍都被视为一级藏品，按沈燮元的话说是“价格噌噌就上去了”。

沈燮元并非第一个整理“黄跋”的人。晚清，潘祖荫刻印过《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六卷，民国，缪荃孙刻印了《尧圃藏书题识》十卷，此后也有很多人做过黄跋整理工作。但由于以往古籍是私人藏书，整理者多半没看到原书，题跋多是托人代抄，难免错漏。

沈燮元希望能整理出一本更翔实、准确的黄丕烈题跋集，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更完整的检索版本。他整理的《士礼居题跋》书稿中首先把出自同一本书但却分散各处的黄丕烈题跋集中起来。其次，通过查看原书、书影等，将错刻、篡改、误认的题跋文字一一改正。第三，将前人未见过的黄跋补进书稿。

如何从浩繁卷帙里找出黄跋?除了南图，附有黄跋的古籍多收藏在日本静嘉堂文库、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地。过去，沈燮元会给这些地方寄送平信收集黄跋，现在他请馆内工作人员通过现代通信帮忙联系。相关领域研究者或学生等见到黄跋相关资料，都会“送”到他案头。

沈燮元“工位”旁的书柜里有几个信封装着书页照片，那是20世纪90年代从日本寄来的经、史、子、集部黄跋照片。“这么比照着一核对，就不会有错了，没有把握的东西不要弄。这些全国只有我有哦。”沈燮元说。

沈燮元的办公桌和桌四周堆满了古籍、书稿，红笔、黑笔、铅笔在他核校80多万字的《士礼居题跋》书稿时各有用处。目前书稿进入二校阶段，他说：“人家做的工作我不重复，要补缺。给后人留点东西，供人家查查资料。”

“我酒量还是可以哦”

熟悉沈燮元的人大多知道，老先生一辈子除了书，便是爱喝两口小酒。“原来喝白酒

的，现在不敢喝了，年纪太大了，喝点10度的米酒。我酒量还是可以哦。”

“沈老的好奇心不仅在做学问上，生活上也是求知欲很旺盛的人。”南图古籍编目办公室工作人员张中仲告诉记者，虽然已99岁高龄，但娱乐圈的事他也“略知一二”。每当看到办公室的“小同事们”在浏览网页新闻等，他会好奇地跟你聊一聊在看啥。

2022年初，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二季开播，第一集拍摄记录了沈燮元的故事。该片总导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跟沈老接触后，发现他比我们想象中更好玩。早几年为了看《非诚勿扰》，他特意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

沈燮元感觉自己只有30多岁。生活简单、有不少忘年交，或许是沈燮元心态年轻的原因。

一位文史方向的青年文化学者曾发朋友圈记录了几段他和沈燮元的趣事：“我和沈老说我最近做古籍数据库了，传统学问怕弄不好。他说新东西他也关注：‘我看微信，还知道南大的校草叫萧草呢。’……请沈先生鉴定钱大昕和潘景郑两部题跋手稿的笔迹真伪。然后沈先生从包里拿出一张广告传单，疑惑地问，这眼镜框旁有个双十二价是什么意思?”

南图典藏阅览办公室工作人员韩超告诉记者，沈燮元的很多忘年交是在南图古籍部看书的读者。“来看古籍的大多是学文献的，都知道沈老，看到他在，会请教他问题。”

“和我年纪差不多的都没有啦。”对于忘年交颇多这一点，沈燮元自己是这么认为的。问他害不害怕死亡这件事，他说：“我不怕啊，五个字：过好每一天。”

“我的生命和书是连在一起的”

下午4点半，家人会到南图来接沈燮元回家。在南图，整理、核校黄丕烈题跋书稿，回到家沈燮元还要接着看书。“我这个头脑比较简单，一心只有书，旁的没有第二个想法。每天都要看书，不看书就会很难受。”

古籍对沈燮元的影响不单体现在研究上，握笔仍是抓毛笔的姿势，写字多写繁体字，曾经的住处是民国时的藏书楼……

嗜书如命，沈燮元的房间里像仓库一样堆满了书。曾到访过他家的南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房间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橱子，还有一座“山”——书山，有时连他睡觉的床上都堆着一些书。

拢共读了多少本书，沈燮元自己也记不清了。“沈老看过的书应该是太多太多了。大家看到的或许只是一个短短的条目，有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信息，但背后是大家看不出的艰辛和积累。”韩超说。

编了几十年书，沈燮元认为：“我每天都很精彩，一看到书就觉得精彩了。因为工作需要，看了很多不容易看到的书。我从书中受益，知道了学问的门径，到现在我对它还有感恩的思想。”

99年的人生早已让一个人明白一生何求。沈燮元说：“看了一辈子书，我没有其他兴趣，就是对书本感兴趣。我跟书不能分离的，就像鱼和水一样。我的生命和书是连在一起的。”

亲历者讲述 50年前接待尼克松访沪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吴宇、许晓青、狄春

“当时风很大，客人在房间开窗，空气流动会让门发出‘咔咔’声响。我们的服务员发现后，就细心地将纸折叠成小条，插到门缝中，噪音就没有了。”

在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之际，85岁的何招法作为历史亲历者，向新华社记者讲述了当年接待美国代表团过程中的这个难忘细节。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其间，双方在上海发表中美之间第一个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

何招法是上海锦江饭店老员工，1972年曾负责尼克松夫妇访问上海期间的客房管理和餐饮工作。

据何招法回忆，当时锦江饭店接待的美国客人接近300人，对总统、总统夫人等重要宾

客，服务人员做到“客到、茶到、毛巾到”，对美方安保人员，也会主动送上一杯热茶或咖啡，“对方原本板着脸的面孔露出了笑容，甚至还主动和我们打招呼”。

今年81岁的夏永芳，退休前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助理，50年前全程参与了美国代表团的访沪接待工作。

据她回忆，1972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小组来华，为尼克松总统访问“打前站”。相关部门紧急要求上海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在两天内赶制出9种糖果，用精美礼盒包装，赠送黑格小组每位成员。

“50年前的中国，一下子批量生产出这些糖果还是不容易的。收到糖果礼盒的时候，一些美国客人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们说，从中间感受到中国的热情和温暖。”夏永芳说。

50年前，黑格“打前站”与尼克松来华时，



▲2月23日，原上海杂技团演员周良铁(戴帽者)分享当年为尼克松一行表演杂技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吴宇摄

都在上海观看了杂技表演。今年72岁的周良铁，是原上海杂技团演员，当年曾两次为美国客人表演中国传统杂技《小武术》。

据周良铁回忆，为尼克松一行表演杂技时，“全神贯注，完全顾不得留意美方观众的反应”。后来他才知道，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当时对这场杂技表演大加赞赏，并对中方接待人员表示，“要是能到美国去演出，肯定是要轰动的”。

50年前，还有一位年仅12岁的上海小学生参与了美国代表团的接待工作。他就是当年中福会少年官外宾接待小组成员，后来曾担任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的桂永浩。

“为了接待尼克松总统夫人来少年宫参观，我提前查找了美国各州的名字、地理位置及其政治、商业、工业等中心城市的情况，默记于心，自信地出现在美国客人面前。”桂永

浩告诉记者。

“当时少年宫有许多兴趣小组，合唱组的同学们唱了一首美国民谣《草堆里的火鸡》。尼克松总统夫人听到后，眼圈都红了。”桂永浩对这一幕特别难忘。

上世纪90年代，桂永浩作为访问学者，曾赴美工作生活三年半。回国后担任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期间，桂永浩推动医院与美国费城儿童医院建立了“姊妹医院”关系。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曾先后接待10批、70余位美国同行访华。如今，桂永浩担任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分管民间外交工作。

回首50年前的接待工作，桂永浩说，这一段经历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的道理，在那个时候，就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 新华社上海2月24日电